

网络自由与思想自由

Table of Contents

不负这个时代——致中国网友的一封信.....	2
给谷歌公司的一封信.....	7
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.....	10

不负这个时代——致中国网友的一封信

在这样一个时代，不管你是否认可，互联网都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信息成为生存的方式。如果对这个时代能有一个梦想，我会希望有那样一天，人们可以自由地上网、自由地获取信息，而没有人会来过问他、没有人能来约束他。

在中国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的概念里，百度可以满足他们搜索信息的需求，微博可以满足表达和互动的需求，微信可以满足社交的需求。百度上那些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”，微博上那些“该微博已经被发布者删除”，微信上那些被封锁了的朋友圈，在一部分人眼中是刺眼的空白或黑幕，而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则是顺理成章的习惯。

对自由的渴望是身处极权之下的人们觉醒的标志。而在一个被封锁、被阉割的网络信息世界里，并非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由的缺失。就像鱼缸里的鱼、羊圈里的羊认为鱼缸就是大海、羊圈就是世界一样，在被封锁、被阉割的网络中行走的人们，也认为他们所见的信息就是宇宙全部的真相。当更多的真相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也像鱼缸里的鱼被放归大海、羊圈里的羊被放归野外一样无所适从，并且选择拒绝，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世界。

非常遗憾，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现状：一面是被阉割、被封锁的信息，一面是习惯于被阉割、被封锁的用户。世界网站访问量排名前三的 google、facebook、youtube，都是中国用户无法使用的；每当有重大事故、群体性事件发生，或者敏感时期，搜索、社交网站就会全网行动，清除那些“有害信息”；执行封锁、阉割任务的 GFW，已经成为中国 IT 技术最先进、最周密的项目。在自由世界看来，这无疑是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；而在中国，至少目前的比例仍属于大部分的网民群体看来，这是他们的使用习惯。

信息体现自由的尺度，也是民间智力的集合。在极权社会，钳制自由的表现之一就是信息封锁；民间智力则被视为极权统治资源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对信息的封锁，事实上也就是对民间智力的收割；民间的愚昧和落后，对权利的麻木不仁、对极权的欢迎和歌颂，也就是智力下降的结果，是极权能够保持长久统治的必需。智力下降导致的另一个结果，是民间创造信息能力的下降。极权正借此恶性循环，达成“长治久安”的目的。

既然我们生存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、一个信息的时代，反抗极权的重要内容就是突破封锁、拒绝阉割。无论有多高的墙，都有更高的梯子，引导着人们去探寻墙外的世界，探寻这个世界的真相，把他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传达给世界。世界也由此一分为二。跨越 GFW 去寻找自由，在一部分用户看来是智力充值的方式，在另一部分用户看来却是不甚必要的，或许还是“充满危险”的。而这正是封锁和管制所期待的，民众的愚昧和恐惧。

只有把自己视为上帝、把国家视为伊甸园的党和政府，才会禁止民众享有智慧，拥有朝鲜人民同样的“幸福”。而智慧之果就生长在枝头，无须蛇的诱惑。选择了被封锁、被愚昧、被阉割，即使把梯子放在面前，也没有勇气登上它看一眼外面的世界。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，寻找翻墙的梯子，并不是技术上的困难，而是态度上的困难。事实上，从 GFW 建成开始，就有技术人士不断随着墙的加高，开发升级着翻墙的软件；这些软件也经由热心人士，不断地在墙内传播。各种翻墙的工具并不难以获取，难以获取的是向往自由的心灵。

未知的世界充满着风险，当局也以此来恐吓民众。以当前的技术手段，很难说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具体哪个动作，不在当局严密的监控之下。幸运的是，人们所能依靠的，并不仅仅是梯子和相关的反制技术，还有越来越多的翻墙的人，以及他们创造的更多的信息。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翻墙，极权就必须花费更多的资源——更多的人力、更多的时间、更多的金钱，从越来越多的信息当中找出它认为有害的一部分加以封锁；如果有必要的话，还要找出发布这些信息的人——定位并予以打击。

在海量的信息面前，这个任务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的。就像众多不翻墙的用户看到的那样，总有足够多的裂隙，把墙外的声音渗入进来；总有足够多来不及删除的网页和信息，出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。所谓安全，并不是幻想一个极权力量所不能至的避风港，而是勇敢地

加入反对它的浪潮，成为海洋的一部分，成为战斗者的一员。终结极权，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。

这并不是说要忽视安全的措施。相反，梯子就是安全措施的一种。雅虎因为出卖师涛，为中国当局提供作为关键性证据的服务器信息，至今仍被当成协助作恶的典型予以展示，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而在党控党有的各种网站里，这种作恶正是它们的日常工作。党控党有的网站和网络服务运营商，可以把用户的每一个行为汇总上报给“有关部门”，使它们能够迅速采取行动，打击那些发布“有害信息”的用户；而在墙外的世界，它们只能依靠各种分析、汇总、比对，获取模糊的“证据”，以此恐吓用户交待“罪行”。

同时，各种安全的措施，也随着翻墙软件的传播，在民间口传心授。关键并不在于怎样做的技术问题，而在于态度和选择。通过翻墙，用户可以获得更充分的关于网络安全的信息，能够更好地掌握安全的措施，选择更加科学、更加安全的上网方式。在一个技术高度透明化、操作高度“傻瓜”化的网络世界，获取相关信息，既是一种基础的能力，也代表了网络用户对网络世界的认知水平。

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世界；诞生互联网的时代，也必然是、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时代。任何封锁、阉割，都在提醒着人们，极权的罪恶有多么广泛，也在强调着对自由的追求是多么迫切。自由是我们击败极权的最丰厚的战利品——我们不幸生活在极权统治的时代，我们也有幸生活在与它战斗的时代，翻墙是你的态度、

梯子是你的武器，被高墙囚禁的朋友们，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赋予你们的抗争的责任。

给谷歌公司的一封信

敬启者：

我是一名在中国大陆的网民，在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已经很久没有“使用”过Google了。当然，我可以借助翻墙软件，越过中国防火长城的封锁，但因为封锁的加剧，让使用谷歌很难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。就好像是出于贫水地区的人，喝水成了一件艰苦的事业。如果不想喝脏的泥水，要耗费许多生命。

这也正是我想说的。因为中国大陆不存在希拉里前些年所说的“互联网接入自由”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大陆人的生命因此在空耗，浪费。我们无法自由地浏览网页，我们无法安全地通讯，我们互相之间被隔绝了。互联网作为一种光彩生命所必需的“制剂”，远离了大陆人。**不要说人类的文明，就连一个人的生命都因此萎缩**，这是我日夜感受的问题。

谷歌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为中国人带来了网络自由。尽管这个时段很短，谷歌就被政治当局勒令退出大陆，但因为谷歌存在于大陆的这个事实而推动的生命感知，却从此常在，并未随着谷歌的退场而熄灭，反而变得很强烈。在墙里思念谷歌，就好像在牢笼里仰望星空。

对于谷歌与中共当局的不妥协斗争，我是站在谷歌这边的。互联网跨国公司不能成为极权政府的帮凶，特别是应该让颞颥、野蛮的当政者知道：**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他们无法践踏的，即使为此付出代价，也是值得的。**谷歌对撼中共政权的传奇鼓舞着我们。

在谷歌退出大陆前后，希拉里发表了那次著名的关于互联网自由演讲。她承诺要帮助中国大陆人获得信息自由，她当时还透露已经投入技术研发，为冲破互联网的极权封锁创造条件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和其他对此有期待的人们等待这一天到来，好像**等待一场针对网络黑暗帝国的解放战争。**

谷歌作为互联网跨国企业，一直坚定不移地传达自由价值观，这是大陆那些貌似强大、实质上是政权傀儡的网络大公司无法比拟的。但是，我也希望谷歌做出更多，特别是面对互联网的红色防火墙，要善于发动攻击，**用谷歌的利剑刺破这堵囚禁世界上不自由网民的高墙。**

听闻美国在研究**全球互联网卫星**上已经获得实质性进展，**天地网络卫星**将悬挂在苍穹之上，为自由接入创造无限可能。我非常愿意看到谷歌继续推动类似自由工程的民用。正像我们都已知道的，**大陆防火墙已经具备主动攻击的能力，希望谷歌顶得住，打得赢。**

我也知道，**谷歌及盟友要面对的不是哪一个公司，不是哪一个恶人，而是一个愿意学习、更对镇压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邪恶政权。**这一场关于互联网自由世界的战争，不好打，也许会很艰苦。但作为大陆人，恳请谷歌公司不要放弃战斗，不要放弃水深火热的中国网民。

中国当局在防火墙内部制造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，即使我不得不使用百度，但也决定不让它磨蚀对谷歌的向往。**人一旦享受过自由，就不能永远被囚禁。**也请谷歌公司上下即使在撤离中国大陆后，仍然对这片**互联网自由的沦陷区**抱以持续的关注，给予强有力的技术解救。

顺颂夏安！

一名中国网民 敬呈

2015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五

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

二十世纪后，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少得可怜。但是有一个横越心理学、生理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的名词，被全世界广泛使用。它起源于中国，发扬于西方，而又「出口转内销」，应用于中国。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「洗脑」。

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（韩战）中，联合国部队惊异的发现，有些被俘虏的士兵，突然信仰了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，竟纷纷诋毁自己的祖国。一个中国人私下说，这是因「思想改造」给战俘洗脑了。美国记者爱德华.亨特（Edward Hunter）听到后，将这两个中国字翻译成了英文。

经他翻译和解释之后，美国社会喜欢上了洗脑（brain wash）这个非常形象的词语。在美国人眼中，不仅政治宣传是洗脑，资本主义的商业广告也是一种洗脑。《纽约客》杂志还刊登过丈夫被妻子洗脑、孩子被父母洗脑的漫画。

1961年，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.立富顿（Robert Jay Lifton）出版著作《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：中国的洗脑研究》（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tarianism: a study of brain washing in china），正式为洗脑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定义。

他专程来到香港，采访被释放的战俘和传教士，并在书中用实例详细分析了洗脑的方式、意义和影响。从此，洗脑一词从街头巷尾的调侃，正

式步入学术殿堂。后来，洗脑一词又从英文翻译回了中文，在中国社会开始流传开来，不过人们对洗脑只限于字面的熟悉。

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：「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。」这正是洗脑一个重要方式——重复。去年年底，央视名主持白岩松在江西财经大学演讲时，当着数百学生的面，脱口而出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」。也许他知道这三年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，也许他知道三年的大饥荒纯属人祸，也许他这么说不过是习惯使然。

我们从小到大反覆听到的词汇，领导说，老师说，父母说，你也说，他也说，慢慢地，习惯成为自然，最后人祸变天灾，「自然灾害」一词深入人心，成了真理，颠倒了黑白是非。即使真相大白后，我们被洗脑的思维仍然很难扭转过来。

拥有话语权的个人或团体掩盖和扭曲历史事实，人为灌输的意识形态便悄然深埋进我们的潜意识，随之改变我们的价值判断。这种典型的洗脑，往往最先从语言灌输起步。

2004年，牛津大学的凯瑟琳·泰勒出版了《洗脑：思想控制的科学》（Brainwashing: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），详解了洗脑的科学原理。她认为，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（neuro science），证明了思想是变动不居的。而生理学可以解释，某些存有通顺的神经轨道的大脑，对于新的信息和创造性刺激易受到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当同样的教条语言（如「三年自然灾害」、「资产阶级反动派」等许多不符事实及带强烈意识形态的词汇）被有意的、重复不断的灌入我们大脑，令我们的神经元之间更加畅通，从而影响、动摇和改变我们的感情和信仰。

泰勒博士在接受《阳光时务》专访时说，今天许多国家的政治洗脑都属于欺骗型洗脑，不再是暴力型洗脑。欺骗型洗脑的特点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获取知识，在一言堂里只许存在绝对正确的某一学说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们只有尽可能从不同渠道获取资讯，培养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，认清并警惕洗脑的技巧和手段，才可以保持我们的精神和信仰，抵抗住恶意的洗脑教育。

问：被洗脑的人康復以后，洗脑带来的影响是否还会遗留？

答：首先，这要看如何定义洗脑。如果你所说的洗脑，是在好莱坞电影《谍网迷魂》中出现的那种人格改变过程，那麼洗脑的贻害就没有。但是，如果你说的是发生在韩战中的洗脑，那就有。这是一种带来创伤的过程，并且有可能影响一个人很久。据研究，接受过思想改造的美国老兵，在战争结束后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。

问：在中国，大多数的学校都会教授传统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，称为思想品德课。请问这与罗伯特·立富顿（Robert Jay Lifton）定义的洗脑有什麼区别？

答：立富顿研究的思想改造，当时发生在青年营、学校这类地方。思想改造是强制高压的，特别是对待监狱囚犯。像集体自我批评、剥夺睡眠、肉体虐待等等手段应用到了极致，说是教育，其实更像是心理折磨。并不是说一些核心的手段现在有所不同，你会发现很多方式都在被不断的使用，比如说服一个人要用的多种方式。其实，最大的不同还是程度上。

问：不同的人遇到洗脑，是否会有生理学上的差异？比如，有些人的大脑会不会对洗脑更抗拒？抵抗洗脑的「自由意愿」在神经科学上是否具有多样性？

答：你要知道，现在很难进行试验性的研究。道德委员会现在不允许了。我们已经有的历史上的证据显示，拥有健全的个人信仰的人更抗拒洗脑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有极端意识形态引导的行为。当被质疑的信仰和一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，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如果受害者认为：「我不是相信某种东西的某类人」，对这种人洗脑，比起让一个人相信他从未接触过的东西，更加困难。

问：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压迫在中国替代了「思想改造」（可能监狱和劳教所除外）。据你所知，洗脑在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存在？如果存在，与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？

答：还是要说如何定义洗脑。有些核心的方法反复被使用，来说服他人并改变他人的思想，例如强烈情绪、控制感官输入和行为输出、不确定性、重复，以及对受害者生理和社会隔绝。一套说服手段在利用这些方法，从最温和的谈话到极端高压的洗脑折磨。这些手段仍然存在，尽管名称可能不同。是否会被推向恶毒的极端洗脑，取决于社会的接受程度，或者说，取决于谁在监控。我不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专家，但是我怀疑，中国社会类似于其他某些社会，在这类社会中，公众能够接受的程度与威权政府私下做的差别很大。

问：你能否简述一下，FACET 反洗脑模式的科学基础是什么？

答：FACET（自由,中介,复杂,结果非手段,思考）依靠我们所知关于人脑的几样东西。

第一，中介和自由是人类行为非常重要的驱动力。控制感和自我感强烈地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、关系以及我们如何行动。

第二，我们的大脑在根本上很懒惰，或者说有效率：大脑进化后，在处理信息时将气力最小化。洗脑手段利用了大脑对输入输出之间的简单路径的欲求。这就是为什么，那么多意识形态都有非常容易陈述的核心信仰。不过，当你仔细去看，它们往往复杂得多，甚至毫无意义。我所说的复杂性，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简要的陈述。要注意的是，正是在思想改造中，洗脑者试图去改变教条。长时间的集体自我批评，讨论，辩论和说教，重点全都是要摧毁对方意识形态的可信度。但是，当任何一个信仰系统成为某个个人、团体和国家的神圣核心，对该信仰系统的批评往往都会失败。

第三，我们倾向于把其他人看作达到某一结果的手段，而非结果本身。所有伟大的宗教，还有一些伟大的哲学，都对这一趋势发出警告。我把它叫做「他人化」（other isation），因为它强迫我们把他人看成非我族类，认为他人不同而且不如我们。我在第二本书《残酷》（Cruelty）里面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。

最后，回到我刚才说的，寻找从感官输入到行为输出最简单路径的大脑进程。人类通过思考自己在做什么，有办法阻碍这种流动，即使是在习惯性的环境下。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：你边弹钢琴边去想你的手指在做什么，你会搞砸你的表演。这种「停下思考」（stop-and-think）与脑前额叶皮层功能激活（prefrontal activation）相关，当人们在学习技能之

时很高，当技能成为习惯后减少。这个功能既可以用来挑战行为，也可以用来挑战信仰。

问：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宣传和媒体操控的地方，我们怎样才能防范被政治权力机构洗脑？

答：第一步要想一想洗脑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一系列想法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他人强加上去。在书中，我讨论了两种洗脑：强迫型的，通过外在暴力的洗脑，和欺骗型洗脑。在严禁虐待他人的情况下，后者更常见。

但很明显，只有在目标没有发现被改变思想的意图之前，才起作用。所以，是否能意识到你在被洗脑才是重点。小心交易的陷阱，注意情绪、不确定性和重复是否被利用，因为它们会刺激一个人的反应。这是一种令人去做、令人相信的心理现象，产生出刺激物的反作用。想要消灭别人控制你感官输入的意图，就多看看其他的信息源，而不只是政府提供的。想要减少对意识形态无可挑战的神圣感，你就嘲笑他们。最重要的是，开发出很好很强大的、清晰的替代信仰，随时准备做脑力劳动来捍卫它，而且不要一个人试着去做。志同道合的风险承担者和社会支持最重要。

问：像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，存在排外的爱国主义情绪，比如反美。请问，这是不是洗脑的结果？为什么？

答：欺骗型的洗脑比暴力强迫型洗脑更多一些。一个明显的敌人，是严禁别人批评你自己的政策，因为你可以把这种批评看作是对组织的背叛——一个存在的威胁，从而令严厉的惩罚合理化。

问：在洗脑的科学领域中，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？

答：正如我之前所言，你不能洗他人的脑，即使你是知名的科学家。我并不是因为要隐藏什么秘密研究，比如从关塔纳摩或其他地方对犯人进行可耻对待得来的。在这些地方，犯人被心理虐待（不光是被美国人，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都故意模糊调查和虐待之间的界限），而是因为没有知名期刊会发表这种研究。你应该知道，在美国参加调查的心理学家和医生受到了他们同事的强烈谴责。

虽这么说，我们仍在研究更多的关于说服的几个关键部分，像情绪如何影响大脑，信仰如何建立并巩固，信仰和个人身份之前关联的强度，以及团体的重要性。道合的风险承担者和社会支持最重要。

问：在洗脑的科学领域中，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？

答：正如我之前所言，你不能洗他人的脑，即使你是知名的科学家。我并不是因为要隐藏什么秘密研究，比如从关塔纳摩或其他地方对犯人进行可耻对待得来的。在这些地方，犯人被心理虐待（不光是被美国人，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都故意模糊调查和虐待之间的界限），而是因为没有知名期刊会发表这种研究。你应该知道，在美国参加调查的心理学家和医生受到了他们同事的强烈谴责。

虽这么说，我们仍在研究更多的关于说服的几个关键部分，像情绪如何影响大脑，信仰如何建立并巩固，信仰和个人身份之前关联的强度，以及团体的重要性。